

东亚文明的近代化之路

—评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李凯航¹

在当代梁启超研究中，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先生主持的“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共同研究班可谓是斐声海内外。其研究团队的具体成果『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一九九九年）²不仅改变了日本学界对梁启超研究的冷淡态度，此后还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

2012年秋，狭间先生受清华大学邀请，担任“梁启超纪念讲座”的第三期的讲座教授，可谓是名至实归。而此次讲座的内容整理后以《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³为题出版，遂得以窥探狭间先生（以下称“著者”）近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最新体会。全书分为八讲，题目如下：

-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
- 第三讲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
- 第四讲 梁启超的“辉煌期”
- 第五讲 “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 第六讲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 第七讲 梁启超与历史学
- 第八讲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

第一讲是在总体的历史格局中把握东亚的近代化过程。著者把东亚近代的“文明史”分为始发期（1840-1860）、发展期（1860-1895）、成熟期（1895-1919）、决裂期（1919-1945）共四个时期（12-13页）。在前两个时期中，中日两国各自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优势逐渐明

显。梁启超正是在这一历史图景中开始接触日本，而这一点又与他（1858-1927）和康有为（1858-1927）的接触密切相关。

第二讲是讨论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著者将康梁的关系分为了三期，即第一期 1890-1898年、第二期 1899-1920年、第三期 1921-1927年三个阶段。大体而言，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依赖依次递减。据著者研究，梁启超在早期受康有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西学”上，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了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的课程表中（31-32页）。此课表罗列众多西学科目，并开始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之比附。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迫使康有为和梁启超放弃了改革，并开始亡命日本。

第三讲是围绕着梁启超在日本办报期间，如何摆脱康有为的影响，走向思想独立的过程。尽管梁启超自己说“广搜日本书而读之。（中略）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但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也是康有为在离开日本后（1899年3月22日），梁启超独立地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著者选取了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对谭嗣同（1865-1898）的评价来说明这一点。原本按照康有为的要求，谭嗣同一方面被梁启超描绘成革新的志士，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必须被描绘成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于是乎在《清议报》中，梁启超在为谭嗣同的《仁学》作序时违心地写道：

“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中略）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中略）《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然而，在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独立地出版《仁学》的单行本时，他执意删除了谭嗣同对康有为的种种赞颂，而且直接赞美谭嗣同的《仁学》吸收了泰西的自

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并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这一事件的象征性意义，著者并非简单地认为是梁启超无意为之，而是评价道：“把谭嗣同从康有为那里解放出来，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开始独立于康有为的结果”。

第四讲是有关梁启超受到新学问刺激后，开始独立的启蒙活动。此时期梁启超倾注全力呼吁建设一个新的近代国家。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言，“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而建设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梁启超首先要做的是，把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源自风俗的积弱”的奴隶式的民众改造成积极的、自觉的“国民”，即“新民”。在连载文章《新民说》中，梁启超指出国家的主体应该是人民。他借用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等西洋哲人的思想用以宣扬一种新道德。当然，据著者研究，在意识到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对国民道德的教化作用，梁启超也相应地补充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道德内涵。

第五讲是关于梁启超以一个亡命者的身份如何应对清末预备立宪。众所周知，1906年清廷派出了以镇国公载泽（1868-1929）为首的出国考察团。但事后看来，这个考察团既没有相应的历史责任感，也就没有相应的成果可资参考。证据之一是花费巨资且耗时一年有余的考察团竟然没有写出独立的报告。更为奇怪的是，经由全团的商量，由成员之一的熊希龄（1870-1937）联络被清廷视为“谋反者”的梁启超，托付其起草为清廷续命的《请定国是折》。梁启超被委以大任后自然倾力而作。为此，他中断了《新民丛报》正常刊行，并且为了保密，还避开东京迁居神户的须磨。在《请定国是折》中，梁启超避开了满汉矛盾，力主模仿日本建立立宪制度。

第六讲是关于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辛亥革命后，考虑到与革命党人的争端，他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选择观望了一年。1912

年10月，梁启超才结束14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北京，受到各界隆重欢迎。他一如既往地以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革命党人保持距离，为此不惜加入袁世凯（1859-1916）主导的进步党。但是当袁世凯走向君主专制的皇帝之路时，他又以惊世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攻击之。此后，在康有为支持的张勋复辟中，梁启超甚至与自己的老师发生过直接的对立。可见，梁启超对共和制度的支持，并非一句空谈。

第七讲主要是介绍梁启超在历史学领域的开拓性功绩。在此，著者以明治日本的“支那学”泰斗桑原鹭藏（1871-1931）对梁启超的评价为线索，讲述了“1920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此节的副标题）。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晚年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立刻引来了包括桑原等东洋史学家的热议。在一篇书评中，尽管桑原对梁启超的评价甚高，还向日本有志于“支那史”的青年学者极力推荐，但他仍不满于梁启超在书中对日本的过低评价，并希望他在著述时不仅仅应该注意到欧美各国的学界动态，也应该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各国的历史研究成果。尽管梁启超表面上对桑原的批评不置一词，但实际上在后来的再版的过程中，梁启超按照桑原的要求更正了若干错误。

第八讲是介绍著者自己在1990年代在日本翻译出版《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过程。这起源于1992年岛田虔次（1917-2000）先生的一个提议。有感于日本青年学者对读解中国古文献能力的低下，岛田先生提议成立一个读书会。而正是这个读书会，成为了后来开拓梁启超研究新地平的人文研共同研究项目“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原本日本人对梁启超的兴趣并不显著。在日本，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梁启超远不及孙中山的名声；而在学术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对象是以章炳麟（1869-1936）为首的汉学家。但正是以

著者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改变了梁启超在日本学术界的配角地位。

在以上的论述中，虽然著者强调梁启超是“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的功臣”，但实际上始终是在“东亚人文学的形成”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展现梁启超的重要意义。正如著者在第一讲及相关访谈中反复阐述的那样，“东亚文明圈”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实体。它以汉字为基本的书写文字，以汉文为高级文章，被称作“中华文明圈”。当它与西方异质的“近代文明”遭遇时，必须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文明基础之上接受异质的新文明，转变成“近代东亚文明圈”。作为“中华文明圈”的底色，最值得关注的是系统阐释人类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朱子学、与其相关的佛学等诸学，东亚各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接受以西方近代科学（西学）为基础的近代文明的。⁴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背景来谈论梁启超的思想的形成。

此外，京都学派引以为傲的细致考证工作仍然是本书的最大特点。比如在有关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评价中，著者仔细对比《清议报》与后来独立出版的《仁学》的差异，从而推论梁启超是为了摆脱康有为影响之缘故。又比如，著者发现，在1900年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出现的“孙行者”在1936年的版本中不动声色地变为了“孙中山”。梁启超因憎恶革命党人，故以孙悟空之名蔑称孙中山。而后来编者对此的改动，淡化了梁启超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长期蔑视。这样细致的考据研究，并不是为了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重新解读被历史掩埋的种种问题。

尽管著者以最大的善意对梁启超做了重新的解读，但梁启超的政治意义却始终被无视了。然而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由梁启超所阐释的“民族”、“国家”、“社会”等等含义，不仅仅是在其自己所在的时代，就是在如今的中国仍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关这一点，著者或许是有意识地避开了。

注释 *

- ¹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该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人类共同体视域下的儒学与近代词研究基地”、“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及“东华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资金”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 ² 中译版《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³ 日本語版『梁啓超：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転換』（岩波書店、二〇一六年）。
- ⁴ 澎湃新闻《访谈·狭间直树：在“东亚”的视角下考察梁启超》2017年03月2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33017）